

與他的高質量譯文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何瞻為譯文所作的大量注釋。與《攬轡錄》和《騷鸞錄》一樣，《吳船錄》注釋的篇幅遠遠超過譯文的篇幅。何瞻為 16,000 餘字的正文共提供注釋 717 條。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個：第一，范成大是知名學者和詩人，他在遊記中大量引用了各種典故及前人的文學作品，譯者需要加以考證說明。例如，何瞻指出，《吳船錄》中引用的一首黃庭堅的詩，現存的黃庭堅文集並未收入，但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卻有記載（頁 57-58, 104）；第二，范成大旅行所經的長江流域，集中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其歷史淵源需要譯者補充解釋，其中包括對峨眉山、三峽、廬山著名風景的詳細介紹；第三，范成大在旅途中不僅遊山玩水，而且接觸了許多文人和地方官，在這方面也需譯者提供傳記資料。基於以上原因，何瞻在翻譯《吳船錄》的過程中，參考了大量通志、地方史和文集。

何瞻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從本書長達八十頁的索引中也可見一斑。筆者從原文中特意找出的多個不常見的人名、地名（黃牛廟、看月榭、巨觚、曹訓、范長生等），都無一例外地列在索引中。值得一提的是，何瞻在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中把石湖翻譯成 Boulder Lake。在本書中，石湖成了 Rocky Lake。

張聰

美國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歷史系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8. \$49.95/£32.95.

讀完這本書，不禁感到驚異，因為這位作者，美國麻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波拉特（Stephen R. Platt），想要把湖南寫成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書名看，作者標出湖南省的愛國者，以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好像是將湖南作為地方史來研究，其實不然。地方史研究雖重地方色彩，畢竟是一國之地方，然而此書作者斷言，「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一樣」（頁 4）；認為湖南人的忠誠不出湖南，也就是湖南第一，即使會考慮到中國，最多是第二位而已。作者更清楚地說，他不是要以湖南來增飾中國，而是要以湖南來「質疑」（question）中國，提出「對中國前途的另類看法」（visions of another Chinese future, 頁 5），不言而喻，那是一個分裂中國的未來。於是，他提出所謂「湖南民族主義」（Hunanese Nationalism），也就自認為理所當然了。這種論調在晚近西方世界也許並不覺得陌生，因為自蘇聯解體以後，總覺得威脅來自過於龐大的中國，且不論政治上的大量「中國威脅論」，即使在學界也時常

出現迴響，所謂「中國有南北兩個不同的民族主義」，或「中國的歷史一直被國家所綁架」等論述。現在出現不認同中國的湖南國，也就不足為異了。

此書作者要建立湖南的民族主義及其獨特的文化認同，勢必要有所本。於是他提到屈原、賈誼等湖南人；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晚清「發現」了湖南學者王夫之（號船山），成為現代湖南民族主義的「祖師爺」（ancestor），也是此書第一章的主題。他提到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告訴我們那是一本分析司馬光《資治通鑑》之作（頁 17），這證明他只是望書名生義，並沒有翻過這本書，因而不知王夫之是在議論書中所載的史事，而不是在分析司馬光的這部名著。接著作者極力敘述推重王夫之的郭嵩燾，以及一大群湖南人，如曾國藩、左宗棠等等；不過，他竟把劉蓉認作「湘軍的一個將軍」（頁 24），容我介紹他看看陸寶千寫的《劉蓉年譜》，以便熟悉一下這位理學家的生平。至於他把湘軍視同湖南的「國軍」，相信湖南人是一「堅強而獨立的民族」（頁 29），都是言過其實之談。

作者說，被湖南人「重新發現」的王夫之是「湖南人的，有別於中國的」（頁 33）；換言之，王夫之僅被湖南人所認同，與中國無關。然而我們知道，當郭嵩燾擬在妙高峰興建船山祠堂時，有許多湖南人反對，因郭氏堅持而得以完工，所以也說不上是湖南人的共識。郭嵩燾固然仰慕王夫之，但原因是「船山能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又題寫聯語，讚美船山先生說：「繼濂、洛、關、閩而起，元明兩代一先生。」都是將王夫之置於中華學統之內來褒揚，並未將其外於中國。郭嵩燾所說的「盛衰」與「國家」也都是在指中國而非湖南。

作者於王夫之之外，在第二章以相當多的篇幅來敘述郭嵩燾，因他認為郭在王的基礎上奠定了湖南的獨立運動。他很明白地說「郭的目標不是要改善儒教中國，而是湖南」（頁 38）。但湖南人卻不領情，痛罵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作者竟將「拔乎其萃」譯作「離開他的親戚」（*apart from his kin*），將「不容於堯舜之世」譯作「他不能容忍堯舜那種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 頁 39），顯然連堯舜是何人亦不知。這不是小問題，而且又非孤例，如郭氏的詩句「海外人歸秋色盡」，詩人從英國歸來時秋天已過，但作者卻譯作「秋色注滿一切」（*the colors of autumn infuse everything*），意思正好相反；「賈生祠宇疏泉石」，詩人所見賈誼的祠堂只有稀疏的泉石之勝，但作者卻譯作「這裏的賈誼廟被石頭溪牀疏忽了」（*here lies Jia Yi's Temple, neglected by the stone creek-bed*）。如果讀文言文要用猜的話，又如何能正確地解釋中國歷史？

作者將郭嵩燾在湖南建廟宇，視之為建立自屈原、周敦頤、王夫之以來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 頁 50），建學校只是要振興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然而，我們知道郭嵩燾創辦思賢學舍，明明是要「漢宋並重，行己有恥」以及法「國初諸老氣象」來改革其他書院的惡習，並不是甚麼「湖南的特殊命運」（*Hunan's unique destiny*, 頁 51）。國初諸老如顧炎武或黃梨州，都不是湘人。我們實在看不出郭嵩燾會視湖南人為有別於中國的特殊族群，「明顯不同於其他的中國

人」(the Hunanese were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e other Chinese, 頁 62)。

第三章講戊戌變法前的湖南改革運動，並引進譚嗣同，說譚曾盡讀船山遺書，並從船山書中發現了民主(頁 87)；譚氏對郭嵩燾之欲改良湖南，也極表同情，以便建立他們之間一脈相承的關係。湖南的改革，也就成為郭嵩燾改革之夢的實施。作者認為，譚嗣同視湖南是「國」而不是「省」，是要提醒湖南人是自主的人民，不受清帝國的節制(頁 80-81)。我們的認知是，當時中國有被列強瓜分的危機，有亡國的憂慮；在此情景下，有些湖南人呼籲獨立，其心志是要救中國於既亡，而不是乘中國之危搞分裂，實甚顯然。但此書作者卻刻意將改革視為湖南的建國運動，自王夫之、郭嵩燾以來，終於水到渠成，好像是萬事具備，只欠一支軍隊(頁 86)。作者將戊戌變法前的湖南改革，說成分裂或排滿，都是言過其實；既然說譚嗣同早在 1896 年就已有反滿的種族主義(頁 88)，何以不到二年就去為滿州皇帝服務，並為之而死？作者將譚嗣同與康有為、梁啟超當作「軍機處的秘書」(頁 91)是錯誤的，如果「秘書」是「章京」的翻譯，則四章京之中，並無康梁！可想而知，作者對於譚嗣同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烈士的說法，甚不以為然，還因而質疑當時的中國到底有沒有民族主義，因當時中國的政治實體是帝國，而譚只為帝國服務了十九天(頁 91)。如此辯解並無效用，因當時的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好像都有民族主義。

作者說，譚嗣同死後二年，唐才常終於建立了湖南的軍隊(頁 93)；他把唐才常的「自立會」譯作「獨立會」，「自立軍」譯作「獨立軍」(頁 95)，以便強調湖南的「獨立」。然而，唐才常在華中的起義，明明是康有為授意下的勤皇行動，但作者一定要說主要是「湖南人的叛亂」，而其使命是要為湖南人「譚嗣同復仇」(頁 96)。我們很難想像，如果唐才常成功了，難道康有為會去當湖南國的公民不成？

庚子事變後，清廷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其中有不少是由省選拔出國的，到日本的最多，此書第四章就強調：當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明」中國民族主義的想像時，留日湘人則出現以湖南為主要的「想像」。當「非湖南人」章炳麟倡導以王夫之為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資產」時，在日本的湖南學生開始更強烈地表示王夫之是他們湖南人的，認為是他們的「精神之父」(their spiritual father, 頁 107)或「湖南民族主義之父」(the father of Hunanese nationalism, 頁 108)。章炳麟這位國學大師兼中國民族主義者絕不會想到，竟有人說湖南人在跟他爭奪王夫之。而此書作者對章炳麟的理解也大有問題，他只知道太炎以種姓排滿，卻不知太炎對中國是一「歷史民族」的論述。他先自以為是地說，太炎認為曾國藩是不自覺的革命黨，而後批評太炎的說法不合乎歷史(頁 105)。我們知道太炎罵過曾國藩是漢奸，但現在作者說曾國藩被章指為革命黨，卻不給我們提供章氏此話的出處。

在作者的筆下，蔡鐸也成了湖南的民族主義者，說蔡氏認為湖南不是像日本的長州藩或薩摩藩，而是像全日本；又說蔡認為將來的湖南會等同英國或法國，而清帝國其他疆域則將會像羅馬帝國一樣地崩潰，而與湖南無關(頁 108)，處處要強調湖南是一個國家。中國固然有很強的地域或省籍觀念，但不能等同分裂主義。湖南的

愛國者在當時中國危亡無日的情況下，提倡獨立以自救並為中國先，相信湖南為中國前途之所寄，以及湖南人可以給中國以新生命，其實都是湖南人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

作者認為，楊度也是湖南民族主義者，並引楊氏豪語「中國不會亡，除非湖南人死光」為說（頁 111）。其實，這句話意謂湖南人會為中國戰到最後一人，更表現了這個湖南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然而作者經過對「中國」一詞在地理和文化上強作解人之後說，「中國不是一個不可分隔的實體，湖南人首先要解救湖南，其次再救中國」；換言之，「湖南的愛國者以建立湖南主權為首要」（the Hunanese patriots would first establish the sovereignty of their own province, 頁 112）。辛亥革命後，不僅是湖南，其他各省也紛紛宣布獨立；史實證明，「獨立」是為了自保，或一時間反抗中央政府，並不是要永久分裂，各省並未各自為國，足見在當時歷史場域內的「獨立」概念，與我們這位作者的理解有相當的落差。

在敘述〈湖南與滿清覆亡〉的第五章裏，作者認為湖南籍的革命黨人，包括黃興、宋教仁在內，也都是為了湖南而革命；然而若按照作者的邏輯，湖南人所組成的革命團體應叫「湘興會」才對，何以稱「華興會」，要振興中華呢？華興會又於 1905 年加入了同盟會，從具有地域性的革命團體華興會、興中會、光復會（作者似乎忘了光復會）發展成全國性的運動。作者也注意到此一發展與其思維相左，然卻辯稱，那是黃興的「妥協」、「權宜之計」（a partnership of convenience），只是表面上與孫中山合作（頁 132）。於是，作者又回到原來論點：湖南人就是為了他們的獨立自主而奮鬥。

作者認知到同盟會成立後，陳天華呼籲超越地域的「泛中國革命運動」（pan-Chinese revolution）；然後說陳天華跳海自殺後，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基於國家的泛中國愛國主義，另一封則要湖南維持自己的組織與認同。作者認為這兩者是不相符的，不似出自一人之口（頁 136）；其實，愛鄉、愛國何矛盾之有？先愛鄉，再愛國也在情理之中。但此書作者刻意區分，所以力言湖南人只是利用同盟會「來推動自己的精神和目標」（頁 138）。接著引用湖南人辦的期刊《洞庭波》，宣揚湖南民族主義，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湖南人所受到的致命威脅，不僅來自滿州人、外國帝國主義者，還有其他的中國人（頁 142），甚至說「滿州人、其他各省的中國人、其他國家的外國人從心底仇恨湖南人，想要盡數殲滅南楚民族」。於是湖南成為被壓迫的民族，雖參加泛中國的同盟會，但並未停止強烈的湖南「分離主義」（separatism），湖南不宜視為省，而應以「種族」（race）視之（頁 143）。我們必須說，以中國省籍觀念之強，欺侮外省人並不稀奇，但是說各省的人一起來欺侮湖南人，豈非有點奇怪？總之，作者認為受迫害的湖南人「會起來驅逐所有的外人」（would rise up to drive away all but their own, 頁 150）。湖南人欲建國以自救的作者言外之意，不言可喻。

作者認為，辛亥革命以後，滿清覆亡，仇滿失去意義，王夫之又成為湖南人的資產，新湖南的認同，於是在第六章裏聚焦於湖南在民初追求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自治。當宋教仁被刺身亡後，湖南的譚延闓宣布「獨立」（頁 158），雖被袁世凱派

遣湯薌銘去鎮壓，但由於船山學社與船山思想在湖南的復甦，引發「湖南省籍主義」將 (Hunanese provincialism) 的全面勃興 (頁 162)，惟不知所勃興的與前述「湖南民族主義」是否同一回事？事實上，作者引述一些不知名的湖南人的說法，湖南從船山「獲致獨立的特殊能耐」(Hunan's unique capability for independence derived from Wang Fuzhi's scholarship, 頁 163)，於是終於宣布湖南獨立 (頁 169)。但是，我們知道當時反對袁世凱的地方勢力莫不宣稱獨立，獨立於袁政府之外，那是反袁而非反華。所以袁世凱敗亡後，包括湖南在內的各省，並未繼續獨立。作者將湖南推向獨立之路似乎又中斷了。

作者在第六章裏以相當多的篇幅詳談楊昌濟，顯然是為他的女婿毛澤東鋪路。楊昌濟在湖南專注教育改革，以「教育湖南的新公民，為新國家奠基」(to educate new citizens who woul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state, 頁 173)。作者更進而提到楊氏重新闡釋王夫之，以強調湖南省的民族主義，認為船山的「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因滿清覆亡而失去其重要性，所以楊氏要使王氏「狹隘」的民族主義成為「省的民族主義」(provincial nationalism)。作者認為這是根據在郭嵩燾所奠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湖南的反抗與自主傳統，以建立「新型的省籍公民」(a new provincial citizen, 頁 177-78, 182)。

在楊昌濟教育下的下一代湖南青年中，在作者眼裏非毛澤東莫屬，雖然有點依賴後見之明。作者為了強調毛之湖南主體性，說毛熱烈地仰慕王夫之，說毛認為辛亥革命是黃興而不是孫中山的運動，說毛接受楊昌濟的教誨以個人主義為尚，以曾國藩為榜樣等等。作者認為毛是湖南地方傳統的繼承者，並以喚醒湖南自任。五四運動無疑是一全國性的反帝運動，以解放中國為目的，但作者認為毛所領導的湖南反帝活動，不是關切中國之從外國解放，而是湖南從「其他」中國人(如張敬堯)的壓迫中解放。作者因而斷言：「五四運動的主流涉及中國歷史議題，反抗外國列強的干預，而湖南的活動家則涉及湖南歷史議題，反抗中國之干預。」(頁 195) 作者顯然把湖南人反抗張敬堯的統治，等同反對中國人的統治。事實上，作者也不得不指出，毛及其伙伴強調湖南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湖南的改革是全中國改革的一部份。然則將湖南人與中國人強作區隔，又為何來？

但是作者並未放棄這方面的努力，1920年的夏天湖南人趙恆惕趕走張敬堯，譚延闓回省主政，毛於6月23日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呼籲乘此機會將湖南建成在政治上與文化上完全獨立的實體。毛等更要建立湖南共和國，強調「中國應分裂成許多小國家」(頁 203)，甚至有比毛更激烈的言論。然則以「毛澤東與湖南自治運動」為題的第七章，主要內容不是自治運動而是獨立運動。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地方對抗中央莫不宣稱獨立，誠如作者所謂旨在「剷除專制主義」(頁 202)，並非如作者所想的要永久分裂於中國之外。孫中山不但宣稱獨立於北洋政府之外，而且在南方成立獨立政府，難道孫中山也是分離主義者？至於當時年輕一輩如毛澤東等人在特定時空內的過激言論，若謂湖南人不是中國人，甚至不是漢人云云，既不符事實，也

無影響，即無意義。毛澤東最後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他顯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湖南民族主義者。作者刻意描述湖南是像瑞士一樣的獨立國家之餘，結果所產生的湖南憲法卻是省憲而非國憲，聯省自治亦非分裂運動，似與作者所設想的邏輯不合。作者力言，「大清帝國不是民國，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頁 220），但歷史發展的結果，今日之中國，除了外蒙之外，基本上承繼了大清帝國的疆域，而且像美國一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湖南只是一個省而已。

作者寫作動機原是覺得在現代中國的論述中，湖南人被忽略了，其實不然。王夫之、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譚延闓、毛澤東等歷史名人，讀史者都知道他們是湖南人。然而作者非要把這些人從中國歷史中區隔出來，將王夫之視為湖南民族主義的祖師爺，將湖南民族主義建築在王夫之、郭嵩燾、譚嗣同之上，甚至於認為湖南人不是中國人，豈是稍讀中國史者所能認可？

內容之外，不得不指出此書若干編輯上的缺失：內容時有重複之處，沒有引用書目可稽，腳注並不周全，漢語拼音全無漢字對照，使有些名不見經傳的姓名無法查考。作者又誤以為上海公共租界在蘇報案中無前例地干預司法，似不知租界內有審判權。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亦未能免於此等缺失，尤令人遺憾。

汪榮祖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By Wen-hsin Ye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xiii + 305. \$55.00 cloth, \$24.95 paper.

葉文心的新著《上海輝煌：經濟情感與近代中國的形成，1843–1949》，是自從李歐梵的《上海摩登》¹以來，又一本關於上海近現代史的力作，不僅與近年來面世的高家龍著作《發明南京路》和《中國藥人》²及 Frank Dikötter 的《異域風情之商品》³相映成

¹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00); idem,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³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